

# 西夏学和藏学的关系

史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 要:** 本文利用汉、藏文文献, 结合出土的西夏文献和文物, 对西夏学和藏学的关系进行探讨。论证了历史上党项族和藏族的密切关系; 阐述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重大影响; 勾勒出藏族僧人在西夏的地位以及西夏封藏族高僧为帝师的史实和重要意义; 讨论了西夏和藏族文化上相互交流, 特别是在印刷术和书籍装帧上的互相借鉴; 介绍了西夏文献、文物中有关藏族的资料, 最后论述了元明时期西夏后裔在宣扬藏传佛教方面的贡献。

**关键词:** 西夏学; 藏学; 藏传佛教; 帝师; 雕版印刷

**中图分类号:** K2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8388(2006) 01- 0007- 06

西夏学与藏学相比, 是一门新兴的学问。随着大量新的西夏资料的发现和深入研究, 西夏学和藏学的关系越趋显明。研究西夏离不开藏学, 同样, 研究藏学也不能忽视西夏学。

## 一、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和藏族的关系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王朝(1038- 1227 年), 其主体民族是党项族, 当时自称“𐼁”, 汉语称为“蕃”。西夏境内还有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吐蕃是世居青藏高原的民族, 是今藏族的先民。在西夏语中读“𐼁”, 即“吐蕃”之“蕃”。在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中, 就以此字译“吐蕃”。此字在西夏汉文文献中又译为羌、西羌、西蕃。党项和吐蕃两个民族皆属羌系, 族源较近, 语言同系, 地域衔接, 山水相连。两者都有较大的势力, 双方的文化交流, 特别是宗教的往来比较多。

早在唐代吐蕃和党项两个民族就有过从甚密的交往。藏文文献《贤者喜宴》记载: 唐代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就曾娶弭药王之女茹雍妃法莫尊为妃。

[收稿日期] 2005- 10- 31

[作者简介] 史金波(1940- ), 男, 河北高碑店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兼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会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宗教学会名誉理事。出版著作 21 种, 发表文章 190 篇。曾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荣誉奖、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郭沫若史学奖二等奖。

“弭药”是一部分党项人的称谓。茹雍妃在西藏建造了拉萨卡查寺。松赞干布还命令在弭药热甫岗建造了雍佐热甫寺神殿。在建桑耶寺时, 曾迎请弭药嘎地之毗沙门区的高僧。当时有的弭药人被列入吐蕃著名译师的行列。可见, 吐蕃和党项族在唐朝初年就有密切往来。<sup>[1]</sup>

后来, 吐蕃和党项两个民族的分布都有了新的发展。吐蕃势力不断强大, 乘唐朝安史之乱向东北方向发展, 其势力达到河西、陇右地区。当时在今陕西、宁夏、甘肃都有吐蕃人居住。在吐蕃向东、向北发展过程中, 党项族也经历着民族大迁徙。唐初党项族首领拓拔赤辞归附唐朝, 被封为西戎州都督, 赐姓李氏。唐中期, 党项族因受西部吐蕃势力的挤压, 在唐朝的允许和支持下陆续向东北迁移。吐蕃强盛, 拓拔氏渐为所逼, 遂请内徙, 始移其部落于庆州, 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故地陷于吐蕃, 其处者, 为其役属。<sup>[2]</sup>党项迁徙后分布的地域为庆州(今甘肃省庆阳)、灵州(今宁夏灵武市)、盐州(今陕西省定边)、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夏州(今陕西省靖边)等地, 后来又进入河西走廊, 多与吐蕃人接近, 甚至

交错居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居住格局。这是两个民族新的密切交往的重要基础。

自唐末、五代至宋初,党项族在河套和河西走廊一带,势力壮大,逐渐形成稳定政权。吐蕃自9世纪后半叶政权瓦解。在党项政权坐大之时,于临近西夏政权的青藏高原东北缘先后建立了两个吐蕃政权。11世纪初六谷部落首领潘罗支以凉州(今甘肃省武威)为中心建立了吐蕃政权,潘罗支助宋攻党项政权,形成吐蕃、北宋夹击党项的态势。这样党项政权与吐蕃政权矛盾加深,不断发生争战。党项首领李继迁攻西蕃,遂入西凉府,知州丁惟清陷没。潘罗支伪降,集六谷诸家及者龙族,合击继迁。继迁大败,中流矢遁死。<sup>[13]</sup>宋景德二年(1005)继迁子德明又谋杀潘罗支。11世纪30年代,吐蕃赞普后裔唃廝囉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市)一带建立了吐蕃政权。唃廝囉也采取了附宋抗夏的政策,宋朝封唃廝囉为保顺军节度使,使之牵制西夏。唃廝囉常与西夏发生矛盾,甚至兵戎相见。

后成为西夏第一代皇帝的景宗元昊在西夏未立国前,于广运二年(1036年)就引诱西蕃人叛唃廝囉。西夏景宗、毅宗、惠宗、崇宗时都有吐蕃人投归西夏。如夏毅宗拱化元年(1063年)吐蕃一首领禹藏花麻无力抵抗宋军攻掠,以西使城及兰州一带土地献给夏国,夏妻以宗女,封为驸马,后升为统军<sup>[14]</sup>。西夏和吐蕃双方关系曲折复杂,总的说来是由对抗转为和缓,发展到关系密切。两族的关系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

西夏惠宗时期调整了与吐蕃政权的关系,西夏掌握朝政的皇太后梁氏,有意结连吐蕃,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年)以自己的女儿向吐蕃首领董毡之子蒯逋比请婚。第四代西夏皇帝崇宗乾顺时期,西夏国相梁乙埋又向吐蕃首领阿里骨为自己的儿子请婚。后来吐蕃首领拢拶又与西夏宗室结为婚姻。西夏中、后期双方关系大为改善,交往比早期显著增多。后来西夏版图中包括了更多的吐蕃人的居住地,吐蕃人在西夏人数不断增加,吐蕃人信奉的藏传佛教影响也不断加大。

包括吐蕃人在内的各族人担任官职时,以官位高低排列座次,只是官位相同时党项人排在前面,体现出主体民族的优势地位。<sup>[15]</sup>在西夏文献中,吐蕃人除僧人外,在政界和军界任职高位者极少,可能吐蕃人的势力和影响主要在宗教方面。

西夏中后期与邻近的吐蕃政权保持良好的、互不侵犯的关系,也反映在西夏法典中:<sup>[16]</sup>“与沿边异国除为差派外,西番、回鹘、鞑靼、女直相和倚持,我方大小检引导过防线迁家、养水草、射野兽来时,当回拒,勿通过防线,刺史、司人亦当检察。”<sup>[16]</sup>西夏以法

律形式规定的所谓“相和倚持”,表明了当时与包括吐蕃政权在内的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

## 二、西夏佛教与藏传佛教

西夏正式立国前,在夏州政权时就接受了佛教,那时接受的是汉传佛教,即中原地区的佛教。西夏建国以后也以中原地区佛教为主,多次向宋朝求赐佛经,并翻译成西夏文字,在五十多年中译成西夏文大藏经3570余卷。当时回鹘僧人在传译佛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在西夏地区因早有藏族居民,从一开始藏传佛教就有影响。西夏中期以后,随着与藏族关系的改善和西夏统治者的提倡,西夏大力吸收和发展了藏传佛教,聘请吐蕃高僧,翻译藏传佛教经典,大大提高了藏传佛教和吐蕃族的地位。吐蕃、党项族风俗相近,原始宗教信仰类似,这为带有藏族原始宗教特点的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夏所辖地区早有信仰佛教的传统,在西夏王朝的大力提倡下,西夏佛教信众更多。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种,笃信佛教的西夏上层和民庶也容易接受藏传佛教。在西夏人的心目中,吐蕃人是笃信佛教的典范。黑水城(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的西夏文《新集碎金置掌文》中有“弭药勇健行,契丹步行缓,羌多敬佛僧,汉皆爱俗文”的记载。<sup>[17]</sup> [封二图1:西夏文《新集碎金置掌文》中有关藏族的记载]这里精练地概括出党项(弭药)、契丹、羌(吐蕃)、汉四个民族的特性,明确指出吐蕃的特点是“敬佛僧”。黑水城出土的另一件西夏文文献中称“东汉礼王国,西羌法王国”。<sup>[18]</sup>西夏人认为东部的中原地区汉族是讲究礼仪的王国,而西部的藏族地区是信奉佛法的王国。当时在位的西夏皇帝十分重视藏传佛教,十分尊重藏传佛教的大师,这为在西夏发展藏传佛教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西夏是掌握王朝政权的主体民族,自然有能力在境内推行藏传佛教。当时在中国具备推行藏传佛教的民族、地域、信仰、民俗、权利等综合条件的只有西夏党项族。由于西夏统治者借助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推动,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得以迅速传播发展。

目前所能见到的汉文、西夏文、藏文材料表明西夏佛教受藏传佛教影响,主要是在西夏中、后期。西夏崇宗乾顺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立于武威的著名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记有“感通塔内羌、汉二众提举”的职衔,在碑文的西夏文部分,与汉文“羌”对应的西夏文字音“孛”,即指吐蕃人。[封二图2: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文、汉文碑铭拓本]可知至少11世纪末西夏的重要寺庙护国寺,已设有管

理吐蕃僧人事务的僧官。

藏文文献中也有关于西夏接受藏传佛教的记载。《贤者喜宴》记录了吐蕃佛教中的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在西夏中期受到重视和发展的史实。西藏噶玛噶举派的都松钦巴(1110-1193年)是该派的初祖法王,他不仅在吐蕃有很大影响,也很受西夏仁宗皇帝的崇敬。仁宗遣使入藏专程迎请,都松钦巴未能前来,但还是派遣弟子格西藏索哇到西夏。藏索哇被西夏皇帝尊为上师,传授藏传佛教的经义和仪轨,并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佛经,很受宠信。后来,都松钦巴所创有名的楚布寺建白登哲蚌宝塔时,西夏王又献赤金纓络及幢、盖诸种饰物。都松钦巴死后,在其焚尸处建造吉祥聚米塔,藏索哇又自西夏作贡献,以金铜包饰此塔。[封二图3:西藏楚布寺]又西藏萨迦派祖师札巴坚赞(1149-1216年)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曾被西夏人奉为上师。可见,至少当时吐蕃佛教中的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都已传入西夏,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sup>[9]</sup>其实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也早已进入西夏。西藏的一些重要文献还记载了西夏的王统。

西夏的西、南部与吐蕃邻近,境内吐蕃人也较多,因而这一带藏传佛教的传播比其他地区更为广泛。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并逐渐向西夏腹地今宁夏一带延伸。河西走廊的凉州、甘州(今甘肃省张掖)、沙州(今甘肃省敦煌)、瓜州(今甘肃省安西)、肃州(今甘肃省酒泉)等地是受吐蕃佛教熏陶较早、较深的地区。

凉州为西夏的西凉府,是西夏的第二大都会,这里佛教兴盛,有很多寺庙。崇宗时在皇室的支持、倡导下,曾大规模修葺护国寺和寺中的感通塔。此塔原来大有来历。碑文汉文部分记载“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宝塔,奉安舍利,报佛恩重。今武威郡塔,即其数也。”<sup>[10]</sup>在竣工时权臣中书正梁行者乚(梁乙逋)亲自前往主持仪式,十分隆重。如上所述此寺庙中已有管理吐蕃僧人的官员。1987年在凉州附近的缠山乡发现有亥母洞遗址,是以岩体裂缝修整建成的修习岩洞,与西藏吐蕃时期的青浦修行地的“大密花洞”相仿。其中发现了不少西夏佛教遗物,包括西夏文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和《令恶趣净顺总持》等藏传佛教经典。藏文史书《安多政教史》曾记载此金剛亥母洞,认为它是汉族地区四大金剛亥母之一。<sup>[11]</sup>在甘州曾译藏传佛教经典。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有一页西夏文残经,使用了翻译藏文佛经才有的专门用语,可知此经译自藏文。甘州可能是翻译藏文佛经的一个中心。<sup>[12]</sup>又仁宗乾祐七年(1176)在甘州所立仁宗御制黑水建桥碑,碑文一面用汉文书写,一面用藏文书写。此碑内容主要是仁

宗皇帝敕令诸神保佑桥道、永息水患,同时也有褒扬贤觉圣光菩萨的深意。贤觉圣光菩萨即在西夏传布藏传佛教、翻译藏文佛经的藏族佛教大师。此碑表明甘州一带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族居民较多。<sup>[13]</sup>[封二图4:甘州黑水建桥碑汉文和藏文碑铭拓本]

位于沙州的敦煌莫高窟和瓜州的安西榆林窟中,有众多的西夏洞窟,其中早期各窟显然承袭了五代、宋初的风格,而晚期洞窟则带有浓厚的藏传密宗色彩。其中莫高窟206、491、395窟、465窟、4号塔楼,榆林窟2、3、29窟,东千佛洞2、5窟,五个庙石窟1、3、4窟,皆为有藏传佛教内容的西夏洞窟。14榆林窟在19窟的汉文题记中记录了西夏时期绘制“秘密堂”,秘密堂即藏密洞窟。<sup>[15]</sup>

黑水城虽处西夏西北偏远地带,但以监军司之驻地之重,佛教也十分隆盛,特别因在城外塔中出土的文物、文献中有大量包括藏传佛教典籍和艺术品而著称于世。

在西夏首都中兴府一带,也发现有西夏时期的藏密佛经和佛画,银川西面的贺兰山中的一座方塔出土了西夏文藏传佛教经典《吉祥皆至口合本续》等九卷、汉文藏传佛教经典《初轮功德十二偈》《是竖橛咒》《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以及藏传佛教木刻本佛画、朱红捺印佛画等。<sup>[16]</sup>[封二图5:宁夏贺兰山方塔]贺兰县宏佛塔是楼阁塔与喇嘛塔的复合形式,这种建筑形式与藏传佛教有密切关系。[封二图6: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其天宫内发现了比较多的藏传佛教佛画,如《上乐金刚图》《千佛图》、《千手观世音图》《坐佛图》《大日如来图》《护法力士图》《八相塔图》等。<sup>[17]</sup>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塔身为宋代流行的八角密檐式,而塔刹为覆钵式,塔外表装饰也充满了繁缛华丽的藏密色彩。有的专家认为西塔表影塑形式从二层至十三层,将二十四僧侣、十六罗汉、八财神、十六护法金刚、十六供养菩萨、转轮王的七宝及佛前供品八吉祥,按佛教的地位由低到高地布局,同藏传佛教的法器曼荼罗有许多相似之处,是典型的藏密题材。<sup>[18]</sup>[封三图7:宁夏拜寺口双塔]

宁夏青铜峡市黄河岸边的一百零八塔,是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宝瓶式白塔,在其附近也发现了西夏时期的藏传佛教佛画。灵武瓷窑堡遗址发现了西夏瓷质素烧如意轮降魔杵等。<sup>[19]</sup>[封三图8:宁夏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

此外,西夏境内的酒泉文殊山、肃北五个庙、永靖炳灵寺、玉门昌马下窟、裕固马蹄寺、武威天梯山、宁夏固原须弥山等石窟中,也有藏传佛教的遗迹。可以说西夏藏传佛教遗迹、遗物遍布西夏地区。

西夏时期藏传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使藏传佛



教的影响自青藏高原的东缘向东传播到贺兰山以东的河套地区。当时藏传佛教不仅对西夏的社会民俗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还酝酿成熟了藏传佛教在非藏族地区传播的体制和经验,为此后藏传佛教的继续向中原腹地地区东传奠定了基础。

### 三、西夏的藏族僧人

由于藏传佛教在西夏影响颇深,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也较多。黑水城出土、西夏仁宗朝修订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规定:“国境内番、汉、羌中僧人”可量才为座主。不仅证明西夏有藏族僧人,藏族僧人还可以作寺庙主持。《天盛律令》还规定番、汉、羌中僧人行童为出家僧人必须能诵十一种经,又分为两种:番、羌所诵经和汉人所诵经。两相比较,番、羌所诵经多出《文殊真实名经》《乾陀般若》《无垢净光》《金刚般若与颂全》。<sup>[20]</sup>这些经典多为藏传佛教经典。由此可见,在西夏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以藏族和党项族为多,而汉族主要还是信奉汉传佛教。在桓宗朝罗氏皇太后印施的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发愿文中,提到三年中“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sup>[21]</sup>西番“指吐蕃而言,即藏族;番指党项族。当时所度僧人很多,而且把西番僧人列于首位,不难想见西番僧人的地位,也可知当时藏族僧人有相当的数量。

吐蕃僧人在西夏佛教界有令人瞩目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吐蕃的佛教大师在西夏被尊为帝师,并形成西夏的帝师制度。帝师在佛教的西夏师位中是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师号。

原来认为中国封设帝师始于元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然而新发现的文献表明在此一百年前西夏已经开始封设帝师。

西夏汉文《杂字》官位第十七中列有“帝师”一词,可证西夏帝师的存在。<sup>[22]</sup>北京房山云居寺所藏明代刊印的汉、藏文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题款中发现了西夏的帝师:“诠教法师、番汉三学院并褊袒提点口褻美则沙门鲜卑宝源汉译,显密法师、功德司副使、口褻卧英沙门,演义法师、路赞訛、口褻赏则沙门遏啊难奈吃哩底梵本证译,天竺大钵弥怛、五明显密国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口褻乃将沙门拶也阿难捺亲执梵本证译,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口褻卧勒沙门波罗显圣,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淳睦懿恭皇帝再详勘。”<sup>[23]</sup>[封三图9:北京房山云居寺藏汉、藏文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贤觉帝师的头衔很多。《天盛律令》所载西夏政

府机构中有出家功德司和在家功德司,专门管理佛教事务。贤觉帝师有西夏功德司正、褊袒都大提点的职衔,总管西夏佛事,不难看出他在西夏的宗教地位极高。西夏有官位,分成高低不等的官阶。贤觉帝师的官位也很高;“口褻”是“授”意,所赐官位“卧勒”是皇帝以下的最高封号,相当于大国王的位置。近几年随着中、俄合作整理俄藏黑水城文献的进展,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又有新的发现。从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西夏帝师有贤觉帝师波罗显胜和慧宣帝师两位,他们都是藏族僧人,在西夏都是地位最高的佛学大师,撰著了多种佛教文献。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刻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其经末西夏文题款与上述房山云居寺汉文佛经题款相对应,贤觉帝师的职称、官位、封号、人名完全一致。<sup>[24]</sup>[封三图10: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署名贤觉帝师证义)]

贤觉帝师在西夏传著了多部经典,其名称在多种文献中出现。

贤觉帝师名波罗显胜,不会是汉人。其传著要经过别的高僧译成西夏文,如德慧为法师时曾译《佛说阿弥陀经》,为国师时曾译《忏悔千种供养奉顺中已集当许文》《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等,因此他也不是党项人。他也不可能是印度人,因为在同一题款中所记亲执梵本证义者为印度人,前面冠有“天竺”二字。再依据当时藏传佛教和藏族僧人在西夏的特殊地位看,有理由认为贤觉帝师应是吐蕃高僧。甘州黑水建桥碑的汉文碑铭中也有贤觉菩萨的记载。该碑系仁宗乾祐七年(1176年)立,碑文为仁宗御制,其中提到:“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悯此河年年暴涨,飘荡人畜,故以大慈悲,兴建此桥,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济之福。……朕昔已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sup>[25]</sup>这里的贤觉圣光菩萨就是贤觉帝师。可能贤觉菩萨在藏族人较多的甘州黑水河上兴建渡桥,作功德善事。后仁宗于此立碑撰文,碑文一面汉文,另一面藏文,也可佐证贤觉帝师是吐蕃人。西夏仁宗皇帝和贤觉帝师关系不同寻常,贤觉帝师是仁宗皇帝封赐的,二人同题《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再详勘”者,当然真正再详勘者当是谙熟佛经的贤觉帝师。贤觉帝师还传著《圣观自在大悲心依烧食法事》《圣观自在大悲心依净瓶摄受顺》《默有自心自劝要语》《禁绝顺要语》《疾病中护顺要语》《默有者随胜住令顺要语》等经,并翻译成西夏文。

在俄藏西夏文文献中出现的第二个帝师是慧

宣。慧宣帝师撰著的佛经也不少,有其题名的《风身上入顺》中有5种要语,每一种要语是名称后都有“中国...帝师沙门慧宣”的题名。<sup>[26]</sup>值得注意的是慧宣帝师的题名前都有“中国”二字。“中国”二字在这里不是指中原地区的王朝,也不是指距中原地区很近的西夏王朝,而是专指吐蕃。它可能是藏文“乌斯藏”或“卫藏”的对译。在黑水城的很多佛教文献作、译者题款前冠有“中国”二字者,都不是党项人,而是吐蕃人。然而他们是在西夏的吐蕃人,所接受的封号帝师、国师、法师等都是西夏的封号,他们所在的寺庙是西夏寺庙。[封三图 11: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藏传佛教要语 署名帝师慧宣传]

西夏还有大乘玄密帝师。有一部由清宫流传出来的汉文本《大乘要道密集》,经陈庆英教授考证,有一些文献是西夏时译传的。其中第6篇《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题款为“北山大清凉寺沙门慧忠译,中国大乘玄密帝师传,西番中国法师禅巴集”。<sup>[27]</sup>大乘玄密帝师是西夏的帝师。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虽未见大乘玄密帝师的题名,但有大乘玄密国师的记载。西夏文、汉文两种乾祐二十年(1189年)印施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中,记载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的高僧有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这些都是藏族僧人。<sup>[28]</sup>在天庆元年(1194年)为刚刚去世的仁宗皇帝刻印的西夏文《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中,又有大乘玄密国师,前面也冠有“中国”二字。<sup>[29]</sup>大乘玄密国师后来升号为大乘玄密帝师。在汉文本《大乘要道密集》第66篇《大手印伽陀支要门》的师承次第中,也记载着大乘玄密帝师,他是噶举派著名祖师米拉日巴的再传弟子。

在夏末、元初僧人一行编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华严忏仪)有华严宗系谱,内有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其中有真国妙觉寂照帝师、新圆真证帝师。这两位帝师在西夏华严宗中有先后的传承的关系。<sup>[30]</sup>[封三图 12《华严禅仪》中有关西夏帝师的记载]

其中寂照曾为国师,传藏传佛教的《净土求生顺要语》,此要语被译成西夏文,并刻印流传。<sup>[31]</sup>

这五位帝师证明西夏的帝师之设已经制度化。这种封藏族高僧为帝师的制度对以后元朝从世祖开始各代皆封藏族僧人为帝师显然有直接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西夏首封帝师是值得重视的一件大事。西夏封设帝师明显地借鉴和发展了藏族地区佛教与政权的关系,这一政教关系的重大调整,不仅对西夏佛教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佛教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尚无关于帝师的明确记录,只有“皇帝之师监承处:上师、

国师、德师”的记载。<sup>[32]</sup>其中“上师”可能是后来“帝师”的前身。

国师在西夏佛教界也有崇高地位。西夏的国师较多,其地位次于帝师,一般国师也有功德司正的职官头衔。西夏的高僧中也有藏族国师。除前面提到的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的高僧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外,西夏还有一位高僧法狮子也是有大量传著的著名藏族僧人,被封为觉明国师,住锡西夏著名的大度民寺。他的头衔也常冠以“中国”字样,表明他是藏族出身。他的著述很多,曾撰著《道之中禁绝顺要语》《中有身要语》《修以觉证顺愚火定要语》《睡梦以觉证顺变身定要语》《魔断问答要语》《死亡回拒要语》等。<sup>[33]</sup>

西夏文佛经题款中还有不少僧人法号前冠有“中国”字样,有的在“中国”前还有“羌”或“西羌”的字样,使其族属更加明确,如集《菩提勇情所学道及果与一顺显释宝炬》的羌中国内三藏知解宝狮子、集撰著《金刚王默有母随智烧施为顺要语》等多种要语的羌中国耶凉訛师、集《呼金刚王本续记》的西羌中国三藏巧利罗摩...师、传著《金刚王默有母之念定为顺》的德王中国上师也晾新拔、集《吉有令净恶趣本续干》羌中国大默有者幢名宣师以及参与集传佛经的西羌中国大孔雀寺三藏巧智行善菩提……。有的法号前没有“中国”的字样,但有“羌国”的字样,也是吐蕃僧人传著《最乐净土求生颂》的讲经律论羌国大法师沙门龙幢。以上这些僧人的撰著都被译成西夏文,分别以写本或刻本传行。<sup>[34]</sup>宁夏贺兰山方塔出土的活字版《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羌译为“中国大宝胜路赞訛库巴啦拶”。<sup>[35]</sup>在西夏文献中有“中国”头衔的藏族僧人,是否都来过西夏应分析对待。凡有西夏官职、住西夏寺庙的都可以确定是在西夏的藏族僧人;而有的则只是藏族僧人的著作被译成西夏文,其本人未必来到西夏。

以上都是从仅存的出土西夏文文献中找出的能传著、集作佛经的吐蕃高僧,还会有一些高僧因文献的缺漏仍不得而知。当然可以推想,在西夏的普通吐蕃僧人数量更多。

西夏文献中出现了很多僧人的法号、封号和职衔,需要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族属及活动。但根据上述资料可以看到,在西夏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党项族、汉族、藏族,甚至印度僧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待 续]

####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载《西藏民族

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2]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党项羌》。

[3]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4] 西夏书事》卷十二、十五、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七、二十九。

[5]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国传世法典》之一,法律出版社,1999年。卷十 司序行文门”,379页。

[6]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四 边地巡检门”,211页。

[7]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 碎金 研究》,《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8]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藏黑水城文献原编号 .292。

[9] 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著、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247、251页。碑文西夏文部分明确指出为 杏眼舍利”。

[11]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杰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137-138页。参见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270-274页、附录。

[12] 日)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13页。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54-55页。

[13]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9-20页。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14] 刘玉权《敦煌西夏文窟分期再议》,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

[15]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16]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载《文物》1994年第9期。

[17] 宁夏文管会、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勘测维修简报》,《文物》1991年第8期。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55-75页。

[18] 何继英、于存海《西夏拜寺口双塔影塑释读》,(台湾)《历史文物》第10卷第8期,2000年8月。

[19] 马文宽、黄振华《宁夏出土带梵字密宗器物考》,《文物》1990年第3期。

[20]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十 为僧道修寺庙门”,406-410页。

[21]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TK.98、373页。

[22] 史金波《西夏文 官阶封号表 考释》,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23] 罗炤《藏汉合璧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肬 考略》,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

[24]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藏黑水城文献原编号 .598。

[25]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9-20页。

[26]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藏黑水城文献原编号 .3708、6344。

[27] 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载《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8]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二册,TK.81、82、83。

[29]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藏黑水城文献原编号 .592。

[30] 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卷第四十二。

[31]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藏黑水城文献原编号 .6904。

[32]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十 司序行文门”,365页。

[33]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藏黑水城文献原编号 .3823、7116、2545、4872、6820。

[34]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藏黑水城文献原编号 .781、4772、8324、2517、7909、5112、2265。

[35]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文物出版社,2005年,19-20页。

[责任编辑 顾祖成]

[校对 梁成秀]

## Fei Xiaotong's Theory on the Corridor of the Tibet- Yi Minority

Li Shaoming

(The Ethnic Institute of Schuan Province, Chengdu, Sichuan, 610017)

Abstract: Through the theory of the famous ethnologist Mr. Fei Xiaotong on the Tibetan and Yi corridor and some concerned discussions, the author explains the specific implied meaning and research field of the theory, showing the significance of doing research on the Tibetan and Yi corridor theory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issues of "multi -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 this essay briefly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theory in China . The essay highly praises the great contribution of Mr. Fei Xiaotong to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ies of Tibetan and Yi corridor and ethnic corridor.

Key Words: Fei Xiaotong; discussion; Tibetan- Yi Pass; theory of ethnic pass; research achievement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dy of Xixia and Tibetology

Shi Jinbo

(The Ethnic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rough the Han and Tibetan documents combing with the unearthed Xixia documents and cultural relic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of Xixia study and Tibetology, proving the closeness of Dangxiang minority and Tibet minority in history; narrating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on the Xixia Buddhism; pointing out the position of Tibetan monks in Xixia as well as the fac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ibetan Eminent monk are Conferred as imperial teachers; discussing the intercommunication of the Xixia and the Tibet, especially the inter- use of printing and book binding; introducing the materials related to Tibet in Xixia documents and relics; at last, elabora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Xixia descendants in spreading the Tibetan Buddhism in Yuan- Ming dynasties.

Key Words: Xixia study; Tibetology; Tibetan Buddhism; imperial teacher; engraving print

## Studies on the Meeting Tablet of Tang and Tibet ——Excerpt Translation of Studies on Ancient Tibetan Inscription

Written by Li Fanggui & Ke Weinan      Translated by Wang Qilong

(School of Humanism, Q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ibet, Han and Britain,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ituation of east inscription of Meeting Tablet of Tang and Tibet with interpretations.

Key Words: Li Fanggui; studies on Ancient Tibetan Inscription; meeting tablet of Tang and Tibet; studies on inscription